



| 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书系 |

王长江 主编

# 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研究

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

谢 峰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研究

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

谢 峰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研究: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  
谢峰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214-10837-1

I. ①英… II. ①谢… III. ①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制度—研究 IV. ①D756.164②D7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805 号



书 名 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研究: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

著 者 谢 峰

责任编辑 朱 超 石 路

装帧设计 田 晗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插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0837-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王长江

—

关于政党政治,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党辞典》赫然解释为:“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斗争”。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会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但在30年前,这似乎更是一个基本共识。翻翻同一年代的书籍,几乎众口一词。在那个年代,我们总把“政党政治”与西方多党制联系起来,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的这种状态,是有其原因的。客观环境方面不论,就自身状况而言,大概和我们这类基本上按苏共摹本建立起来的政党的特殊性有关。政党源自西方,随着代议制民主和议会政治的成形而成形、发展。苏共模式的党则与西方原生态的政党迥然不同。它们既非产生于既有体制内部(在这一点上只与社会民主党类似),也不是要沿着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获得政权(这一点和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了共同性)。共产党的政权,乃是用领导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的政治革命的手段取得。这种“革命党”的特质,决定了它们

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体制机制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有其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显而易见，在革命党状态下，党和政权之间是一种对抗、离心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示与旧制度、与体制内政党的决裂，才能动员起推翻现存制度的足够力量。在这种现实面前，类似政党活动共同规律这样的话题，绝对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执政后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在执政条件下，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向心的关系。无论是在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属于什么性质的政党，需要思考的问题，都变成了如何处理好和政权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控制公权力、运用公权力，获得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由于各种政党性质不同、能力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深有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殊有同，但不能说，有的政党需要思考这些问题，而有的政党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不管人们的好恶，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的执政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课题，研究这些共性问题，探索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所有政党都要面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党来说，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就成为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缺乏认识，继续停留在革命党状态，沉溺于自己的特殊性，往往容易使我们陷入一种夸大特殊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的思维，不屑也不善于吸收借鉴他人的经验。这不但妨碍我们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而且会使我们变得思想狭隘、僵化，结果往往是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仍然要犯；别人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然在付出；别人吃过的亏，我们照吃不误。

如果说，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搞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走的毕竟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和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共同性，因而强调特殊性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使我们重新关注政党政治，而且不再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关注。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政党政治,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理念。什么是政党政治?在我看来,所谓政党政治,即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党介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政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反过来说,只要政党在政治中具备这样的定位和功能,就都可以叫做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所当然地列在其中。

政党和民主政治相连。究其根底,政党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其活动都围绕民主而展开;或者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或者把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党建立之时,虽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此,当我们党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时,才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政党围绕民主而运行,因推进民主而发展,这是政党政治不可更移的规律,也是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离开了这一点,便离开了基本航道,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二

作为把民众与公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工具,政党政治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一方面,政党的首要目标(对相当一部分政党来说其实就是唯一目标)是控制公权力,政党活动因此而成为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表达和组织民意是政党的基本职责,因而又和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政党政治横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之间,是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具体说来,政党政治的研究包含了以下基本范畴:政党与民众,政党与政权,以及既作为组织体又作为组合体的政党。

政党与民众。把所代表的民意输送到公权力的运行中去,是政党活动的起点。但是,正因为政党和民众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委托关系,引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党不可能代表全体民

众。那么,它要代表多大比例的民众,才既有控制公权力的资格,又能有效地整合民意?在现实中,政党政治确实经常遇到这一矛盾。代表性过广,往往会在主张上显得庞杂、矛盾、不严谨而失去吸引力。代表性明确,却往往又因过于排他而大大缩小自己的支持面。这一矛盾,至今仍然是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又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或许是无可替代的,但作为工具,却正在遭遇其他工具(新兴媒体、民间组织等)的竞争。事实证明,政党不可能靠排挤它们为自己赢得空间,更不能利用政府的强力来压制它们的发展,而是不得不学会和它们和平相处、良性互动。对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政党与政权。在执政状态下,政党控制政权,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无需研究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权力由于其自身特性,对政党既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有强大的腐蚀力。这使得政党一方面要控制政权,另一方面又要和公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表明,若执政党和公权力毫无距离,固然能使公权力的运行全面体现执政党的意志,但是,公权力的腐蚀也会同时使政党变形,甚至使政党沉溺于权力,逐渐丧失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工具的作用。和公权力距离过远,当然会导致政党无法驾驭公权力,但距离过近,则会使得权力失控。总之,政党与公权力的距离和公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之间,绝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政党。这里的政党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组织体的政党。每一个具体的政党,都是一个组织。作为组织,要有能够吸引成员的意识形态,要有能够发挥整体力量的组织状态,要有能够担当起职责的人才。这些本身便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事实上,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都是和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相协调的,并随之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组织变革和改革的过程。当然,防止政党在变革过程中解体,同样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二是作为组合体的政党。在这里,

“政党”只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民众—政党—政权”分析框架中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指的实际上都不是某一个具体政党,而是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构成政党体制,共同发挥连接民众与政权的作用。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政党体制能够最有效地履行政党的功能? 在一些非政党(如社会组织、传媒等)开始明显地挤占政党一部分功能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如何运行? 这些都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几对关系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复杂图景。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这些关系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例如,政党不能只是准确地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虽然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可以非常明确,政党为之所做的奋斗也可以不遗余力,但如果这种诉求占量过小,政党就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掌握公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这里体现的是政党、民众、政权三者之间的复杂函数关系。又如,严密的组织形式可以使政党整体的力量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等级体系也往往容易使组织自身出现严重的官僚化,使被代表者诉求的输送变得艰难。这里体现的是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民众诉求三者之间的关系。再如,获得了执政权的政党显然在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并不一定保证它始终如一地反映民意。相反,在缺乏公权力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公权力的腐蚀可能会使原本有着强大民意基础的执政党逐渐背离初衷,把公权力变成了营私的工具。这里体现的又是政党、公权力特性和民意的三者互动。

考察中国问题,同样离不开这些范畴。恰恰相反,因为过去研究不够,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深化研究的着力点。在我们看来,弄清中国政党政治,把握其未来走向,既要研究中国党自己的情况,也要下大力气研究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情况,更要在两者的比较中探寻政党活动规律性的东西。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系正像它的名称“政党政治与中

国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围绕这些方面而展开。

### 三

政党政治是一项现实性极强的研究。即使我们突出强调它的学术性，依然不能不带有直接的现实关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把理论性、学术性与正在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更多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我国，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这种关照十分必要。在研究中我们力求坚持以下原则，以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体现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第一，开放性。既然政党政治要探索的是共性、规律性的东西，就必须面向世界，努力摆脱过去的局限。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在走出了最初的盲目照搬阶段，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中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之后，我们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甚至一度把美国也列为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那样的事情，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著名的论断，就是在那时作出的。遗憾的是，后来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冷战兴起，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随之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也逐步走向封闭、教条、僵化，过多的东西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事实上，苏联模式排他性地成了我们唯一效法的模式。后来，我们和苏联也决裂了。从此，借鉴、学习几乎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区，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政党再无一国一党能让我们产生兴趣，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得到承认，我们开始放开眼界，先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和经验开始，进而对其他类型政党的看法也越来越客观，最后形成了“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认识。这是一种很高的认识境界。但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仍然对我们有着强大的影响，真正做到这一点尚有距离。

在开放性上,始终要处理好的一个关系是,既大胆吸收借鉴,又不盲目照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开放不等于照搬。由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决定,任何照搬都不可能成功。非但性质不同的国家、政党之间无法照搬,即使性质相同、文化相近,照搬也是不可取的。同时,又不能因为怕照搬而不加区别地把他国他党的经验排除在外。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实践中,后一种错误发生的次数更多一些。

第二,包容性。包容是一种心态,是开放的前提。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自现实。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事实简单地回答是与否,无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认识。相反,理性地看待政党政治中的各种现象,研究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性,从中获得启迪,才是我们的目的。这就需要有包容之心,有海纳百川的肚量。唯此,我们才会有更高的视野。我们以往的一个误区是,对纷繁复杂的政党一概以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正确与谬误分类,凡属后者,必先否定之,尔后再找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党思维。革命党思维有助于各社会阶层在阶级对决中进行意识形态“站队”,但对执政而言,这种“站队”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包容不是对特殊性的忽视,更不是否定特殊性。相反,在深刻认识彼此特殊性的条件下,才有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容恰恰是对丰富性、多样性的接纳。因此可以说,没有包容的心态,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开放,还会从好不容易得来的开放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一个成熟的民族,往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显示包容性的民族。邓小平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看来,这里的“左”不是那种原本意义上激进的“左”,恰恰指的是那种排斥一切、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态度。它是近几十年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前沿性。当今世界千变万化,是一个已经被人们用“信息社

会”命名的时代。借助新型媒介的力量,巨量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形成信息爆炸,使人们目不暇接。一种创新,今天看上去非常新颖、非常时髦,明天或许就会变得陈旧。政党政治亦如此。我们看到,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不过二百多年,但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政党产生之初所想象不到的。政党不但遍及全球,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个国家不实行政党政治,而且类型更加多样,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即使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政党,也在适应新的变化,调整自己。继续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些政党,不但难以获得正确认识,还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显然,我们的研究要把握住当今时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追踪政党活动的最新动态,了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体现对政党政治的最新思考。

讲求前沿性,不等于一味地求新求奇,被一些政党表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所谓创新所迷惑。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并不少见。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平台,政党同样难以免俗。因此,在研究和探索中拨开表象,拂去喧嚣,抓住本质,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也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向。

以上的话,是我对这套书系意图和思路的理解,希望能够在本书系中得到较好体现,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认同。如果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还能对内容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我们将不胜荣幸和感激。

是为序。

2013年10月6日

(王长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协商时期的领袖选择</b> .....         | 1  |
| 一、传统的领袖选择方式：非正式协商 .....            | 1  |
| 二、1963 年领袖继任危机 .....               | 7  |
| <b>第二章 领袖选举制的颁布与修订</b> .....       | 15 |
| 一、新的领袖选择方式：议会党团制 .....             | 15 |
| 二、爱德华·希思与挑战制的出台 .....              | 23 |
| <b>第三章 挑战制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崛起</b> ..... | 35 |
| 一、1975 年的领袖选举 .....                | 35 |
| 二、撒切尔夫人胜选的选举因素分析 .....             | 40 |
| 二、撒切尔夫人胜选的意识形态解读 .....             | 48 |
| <b>第四章 挑战制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辞职</b> ..... | 60 |
| 一、“撒切尔主义”与党内分裂的焦点：欧洲 .....         | 60 |
| 二、两次挑战：迈耶与赫塞尔廷 .....               | 71 |

|                             |     |
|-----------------------------|-----|
| <b>第五章 约翰·梅杰：胜选、辞职与重选</b>   | 82  |
| 一、梅杰与领袖选举制的修订               | 82  |
| 二、欧洲问题与梅杰政府的危机              | 93  |
| 三、1995 年的领袖选举               | 102 |
| <b>第六章 威廉·黑格：领袖选举制度大变革</b>  | 114 |
| 一、三轮选举与黑格的胜出                | 114 |
| 二、领袖选举制的反思                  | 120 |
| 三、工党改革：另一种激励因素              | 128 |
| 四、混合型选举制的出台                 | 138 |
| <b>第七章 “后撒切尔主义”时期的保守党领袖</b> | 143 |
| 一、伊恩·邓肯·史密斯与“不信任投票”         | 144 |
| 二、迈克尔·霍华德与领袖选举制的重审          | 150 |
| 三、戴维·卡梅伦与英国保守主义的困境及前途       | 154 |
| <b>结论</b>                   | 169 |
| 一、保守党领袖选举制度演变的影响因素          | 169 |
| 二、保守党领袖选举制度演变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 177 |
| <b>附录</b>                   | 186 |
| <b>主要参考文献</b>               | 199 |

# 第一章

## 协商时期的领袖选择

英国是议会制国家,在英国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负责组建政府,政党领袖担任英国首相。因领袖对政党发展以及赢得选举影响重大,且政党执政后领袖担任首相管理国家,地位十分重要,因此,领袖推选历来为英国各党重视。作为被誉为英国“天然的执政党”的保守党,自然也十分重视领袖的选择。

### 一、传统的领袖选择方式:非正式协商

对政党来说,领袖的地位普遍是重要的,但对保守党来说,与其他一些政党相比,它的领袖的地位更加重要。保守党领袖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他可以自主选择整个内阁阁员(影子内阁阁员),可以任命政党主席和党内官员,在与同僚商议后,有权独自决定政党的政策以及政党在大选中发布的竞选宣言内容。保守党也召开全国政党代表大会,但大会是一个供党员讨论、以了解党员意见的论坛性质的集会,所做之决议对领袖仅有建议作用,不能约束领袖的行动。一旦政党大选获胜,领袖成为英国首相,他对阁员的选择以及所做的政策决定,直接影响政党的前途

和国家命运。

保守党的前身是托利党,成立于17世纪70年代,到1832年议会改革后改称保守党。在1965年前,保守党在选择领袖方面没有正式的规则规定,就有关现任领袖的免职问题,其内部也没有相关的机制。<sup>①</sup>领袖是由党内少数高层人物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没有任期限制,换句话说,只要党内认为他能胜任领袖之职,而未有反对之声,他可以无限期担任。参与协商的高层人物主要包括政党前领袖、内阁(或影子内阁)阁员、上下两院议会党团领袖、政党主席。少数高层人物共同对党内可能的人选进行审议、评估和商讨,一旦他们对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依据惯例,此人便被拥为领袖。不过,高层协商的范围是不固定的,也即不固定征求上述哪部分人的意见,因此,参与协商的人群范围很窄,有时仅两三人便可决定。只有当保守党处于执政期时,政党需要将党内协商产生的继承人选上报英国国王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野时政党可自行决定,无须经上述程序。

在协商产生领袖人选的过程中,保守党高层虽然也会关注本党议员对可能的人选的意见,但是,政党并没有将议员参与协商过程的做法正式化和制度化。保守党上述选择领袖的方式,被评论为是“非正式的”,因就有关人选是如何产生的,很少有信息披露出来,因此,领袖产生过程带有“神秘”色彩,由高层组成的圈子在英国政界又被称为“神秘圈”。

当保守党执政时,首相即是领袖,如政党处于在野期,则前任首相担任领袖,如在1924年、1929—1931年和1945—1951年保守党在野期间,前任首相一直担任政党领袖的职务。如果当政党在野而又未有前任首相、或前任首相不能或不愿担任领袖之职,那保守党有两个领袖:一是下

---

<sup>①</sup> Dean McSweeney, "Changing the Rules Changed the Game", *Party Politics*, Vol. 5, No. 4, 1999.

院议会党团领袖，一是上院议会党团领袖，<sup>①</sup>在 1965 年之前，保守党未曾于在野期选择过一次新领袖。<sup>②</sup>直到保守党再次上台执政时，政党开始选择领袖，经常的情况是由上院领袖或下院领袖中的某一位担任全党领袖，经国王认可后，组建政府，就任首相。<sup>③</sup>新首相随后在由上下两院保守党议员组成的政党会议上正式被确认为政党领袖。<sup>④</sup>例如，阿瑟·鲍尔弗、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安东尼·艾登、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都是在担任首相的几天后继任政党领袖。不过，也有例外，如在 1922 年，安德鲁·博纳·劳坚持在接受国王邀请组建政府、担任首相之前，在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会议上被确认为政党领袖。

如此看来，在 1965 年之前，保守党在由谁担任政党领袖的问题上，是从一种执政的角度来考虑的。政党领袖由首相或前任首相担任，当政党在野而又未能有前任首相担任时，保守党则认为择人担任领袖一职并无必要。

保守党的领袖人选从本党议会党团中产生，也就是说，领袖必须是议员。在整个 19 世纪，保守党领袖多来自上院，但到 20 世纪，保守党内逐渐产生一种认识，即领袖应从有议会选举经历的议员中产生，即从下院议员中产生。在 1923 年，斯坦利·鲍德温取代上院贵族柯曾成为领袖，1940 年温斯顿·丘吉尔取代上院贵族哈利法克斯成为领袖，反映出

① 1929—1935 年保守党参加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斯坦利·鲍德温被认为是保守党领袖，因他是保守党的前任首相，但是，当 1915—1922 年保守党参加由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时，博纳·劳以及之后的奥斯汀·张伯伦仅是保守党在下院的领袖，因他们不是保守党前任首相。

② Leonard P. Stark, *Choosing a Leader: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 Ipswich Book Co. Ltd, Ipswich, Suffolk, 1996, pp. 12—13.

③ Leonard P. Stark, *Choosing a Leader: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 Ipswich Book Co. Ltd, Ipswich, Suffolk, 1996, p. 15.

④ Nigel Fisher, *The Tory Leaders: Their Struggle for Powe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7, p. 6.

保守党在领袖人选产生范围方面已经发生变化。1963年保守党在执政期间选择领袖,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放弃上院贵族称号,以平民身份通过补选当选为下院议员,担任政党领袖,再次确认了保守党的这一新原则。<sup>①</sup>自此之后,保守党领袖均从下院议会党团中产生。<sup>②</sup>下院议员根据地位分为前座议员和后座议员,能够进入保守党高层精英视野的领袖人选通常是前座议员,那些想成为领袖的后座议员需要通过努力,包括在议会中展现才华,被本党领导层关注和认可,并被延揽入领导层,成为前座议员,才可增加其成为政党领袖的可能性。

保守党以少数高层人物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并不是政党有意识地采用,而是在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保守党起源于议会内部,属于内生型政党,其议会外党组织在19世纪末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在保守党开始关注议会外党组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议会内政党在党内事务中有着绝对权威。另外,从起源看,保守党属于精英型政党,代表社会上层利益,党内实行由上至下的统治,由少数高层人物决定领袖人选,也符合政党意识形态中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

保守党上述产生领袖的做法,被认为具有谨慎、灵活和专业的优势。从谨慎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意见是在少数高层人物当面协商,或者是在高层小群体会议中收集、汇总起来,参与的人群范围很狭窄,整个过程运作隐秘,媒体、党员、议会外党组织和社会大众并不参与其中,候选人不需要开展竞选,因此,不需要在媒体、党员、党组织及民众中进行宣传和动员活动,这样便没有造成政党公开分裂的危险。从灵活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产生,保守党没有制定固定规则,协商程序也没有固定规则的约束,因而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以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从专业的角度看,领袖人选出自高层,且由高层协商产生,可以说是由最深入

---

① Nigel Fisher, *The Tory Leaders: Their Struggle for Powe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7, p. 6.

② 后文所提之议员均指下院议员,若是上院议员,会加以注明。